

《历史的转折》丛书

主编◎王维礼

生死攸关

攸 迪·著



《历史的转折》丛书（三）

主 编：王维礼

副主编：舒 闻

生 死 攸 关

攸笛 著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历史的转折》丛书（三）

生 死 攸 关

攸 笛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全安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6.75印张 150 000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200册

I S B N 7—206—01685—5

D·500 定价：全套 27.00元

序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作为开篇的第一句，表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势力”震撼着欧洲的大地。在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这个“共产主义幽灵”却又徘徊在中华大地上，为中国人民指明了祖国解放的航向。如果说，70年前，先进的中国人，还只是开始一种可贵的探索，那么，70年后，共产主义却也经历了无数飓风骇浪，艰难险阻，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展现了美好的前程。尽管人们回顾这70年历史时，有骄傲，有慨叹，有经验，也有教训。然而，不管抱有什么目的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中华大地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亚病夫”成为历史，“一盘散沙”已经过去，中华民族跃然崛起，东方巨龙奋起腾飞！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发展遭到严重挫折，马克思主义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领导中国人民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特点，中国革命的经历，都是有直接关系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革命活动的，它深深扎根于中国土地之中，一切为了人民。在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共产党人始终以中国人民利益为奋斗准绳，从实

际出发，独立地分析世界形势和中国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胜利道路；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当然，这个过程是曲折的，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其间丰富的历史经验，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之本。特别是在那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风云变幻，共产党人以坚定的无产阶级信念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探索出通向目的地的航程，驾驭着历史的风帆，克服万千困难，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用血的代价谱写出的胜利凯歌。人们应当认真地学习，汲取这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伟大的精神力量。它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认识水平，增强信心，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进方向，是非常有意义的。基于这个目的，我们编写了《历史的转折》丛书。

《历史的转折》丛书，围绕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中心思想，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6次重大转折为基本内容，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经过无数艰辛曲折，解决各种复杂矛盾，找到了从新民主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变旧中国为新中国的光辉历程。

丛书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重大历史转折为主题，分6册，每册一个中心，又相互衔接，反映出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曲折性、复杂性及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坚定性和创造性。

一、《开天辟地》（1915—1923）

以五四运动为界标，开始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飞跃。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

路中，经历了从向西方学习转向追求社会主义；从崇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转折，从而使中国民主革命具有新的特点，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推动了中国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二、《独辟蹊径》（1927—1931）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血腥的白色恐怖，排除万难，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中国革命的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通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在探索新道路过程中，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直前，百折不挠，使革命的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三、《生死攸关》（1931—1935）

“左”倾教条主义曾经给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带来严重的危害。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革命紧要关头，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长达4年的统治，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引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一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

四、《同仇敌忾》（1936—1945）

从国共10年内战到第二次合作，是从国内战争到一致抗击外敌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与实施，是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关键。国民党当局转变政策，接受了第二次合作抗日，实行抗日战争，对国家民族也是有贡献的。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成为中流砥柱。而国共合

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与发展，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保证。

五、《十字路口》（1945—1949）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或者是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黑暗统治；或者是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在这严重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进行了极其复杂、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国民党政府拒绝了人民的善良愿望，点燃起内战战火之后，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人民革命力量，以自卫战争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打垮了国民党的军事防御，在决战中消灭了国民党军事主力，最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六、《继往开来》（1948—1956）

中国人民经过 28 年英勇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1949 年，中国开始实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跨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打退了美帝国主义的进攻，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了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恢复。1953 年开始，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起来，胜利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奔向新的航程。

在丛书的编写中，我们几经研讨，在选材、体例和编写方法方面，作了一些探索。我们确定以历史转折为中心，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及其作用为重点，以基本史实为依据，从具体事件和人物活动入手，力求生动地具体地描述这些波澜壮

阔的历史图画。试图克服一般史书的平铺直叙的平淡，努力使内容重点突出，史实的准确性和情节的具体性、生动性、通俗性相结合，增加可读性。我们希望这种尝试，有助于广大读者对内容的理解，有利于历史知识的普及，更有利于提高广大干部、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因此，本书对于高中及大专院校学生、社会青年、广大干部，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会有所裨益的。当然，由于学识能力所限，尽管我们的作者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主观上的设想和编写成果总会有些距离，然而，作为一种开拓，相信会有益处的。不足之处，衷心希望得到批评与指正。

王维孔

1992年春于长春

目 录

序.....	(1)
“左”倾阴霾.....	(1)
远方来信引起的风波.....	(1)
米夫导演的一幕.....	(7)
逆境之中的毛泽东.....	(13)
洋“太上皇”.....	(19)
坐失良机.....	(25)
“愚卖爷田心不疼”.....	(31)
濒临绝境.....	(38)
没有准备的“准备”.....	(38)
“你喂的鸽子飞了”.....	(45)
从这里迈出第一步.....	(51)
战机转瞬即逝.....	(58)
血战在湘江之滨.....	(64)
担架上的会商.....	(72)
生死攸关的转折.....	(80)
乌江边的新年.....	(80)
决定命运的3天.....	(89)
毛泽东的“得意之笔”.....	(99)
“追剿军”望江兴叹.....	(109)
会理城下的风潮.....	(118)
海子边歃血为盟.....	(123)

红军不是石达开.....	(129)
北上与南下之争	(141)
会师欢歌中的弦外之音.....	(141)
新的目的地——川陕甘.....	(147)
“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156)
卓木碉的一出丑剧.....	(166)
打开北上之路.....	(171)
迎接抗战新局面	(179)
行程 2 万到吴起.....	(179)
陕北奠基.....	(185)
重新踏上北上征途.....	(191)
三军大会师.....	(199)

“左”倾阴霾

远方来信引起的风波

1930年8月，在广袤的西伯利亚的土地上，一列开往中国东北的国际列车在向东疾驰。在车厢内不同肤色的形形色色旅客之中，端坐着一位年轻英俊、目光炯炯的中国人，他就是周恩来。

这时的周恩来才32岁，但他的名字在中国的政治圈子中却已无人不晓。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他在国共两党中均担任过重要职务，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他在政治斗争中所显露的才智，就连他的对手也不得不为之折服。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受中共中央之命，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第一枪。中共“六大”以后，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列车在茫茫夜色中奔驰，周恩来却难以入睡。他紧靠着车窗，两眼望着窗外，平静的表情掩盖着内心的焦虑与不安。自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员就到处被抓被杀，由6万多人锐减到1万多人。但是，他们没有被敌人的屠杀所吓倒，在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之后，他们又起来进行战斗。中共“六大”以后，党的组织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纷纷建立，红军逐步发展和壮大。到1929年夏天六届

二中全会时，全国党员人数已有6万9千多人，超过了大革命时期。到1930年夏，党领导的革命游击战争已经扩展到十几个省、几百个县，建立了大小15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已发展到7万人，作为直接主管军事和组织这两方面工作的领导人。周恩来深知取得这样的成就，全党同志付出了何等艰辛的努力。

然而，中共中央在克服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之后，又于1931年6月出现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要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取得胜利，夺取全国革命政权。在这一主观、武断、狂热的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开始在全党推行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在南京、武汉、上海举行暴动和罢工，同时调动各路红军进攻大城市，结果各地起义纷纷失败，各路红军也遭受重大损失。

7月23日，共产国际在研究了中国国内的形势后作出决议，强调“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批评了李立三的“左”的策略错误，瞿秋白与周恩来正是带着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匆匆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周恩来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时，已是8月19日。他立即传达了共产国际对李立三“左”的错误的批评，同李立三和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进行两次谈话，通过耐心的说理和具体的分析，终于将他们说服。接着，中央政治局又连续举行会议，听取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并进行了讨论，基本上统一了对形势的看法。

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举行了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全面分

析了形势，批判了李立三的“左”的策略错误，指出中共中央“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并批评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

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暴动的计划被取消，停止了红军进攻大城市的计划，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工作被提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已在实际工作中得到纠正。中国共产党犹如一条行驶在大江中的航船，在绕过了急流险滩之后，又驶进了平缓的主航道中。

正当中国共产党顺利地解决党内分歧的时候，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却在升温。

1930年10月23日，共产国际发出给中共中央指示信，信中做出了一个三中全会以前国际不曾提出过的新的论断：

“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立三同志底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因此一定要指出“立三路线底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实质。”这个结论不但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论述显然不同，而且与共产国际7月23日决议的论断也截然不同。

随后，共产国际东方部了解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对李立三错误的定性共产国际10月指示信不相吻合，便展开了关于立三路线错误的讨论，对六届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大张挞伐，全盘否定六届三中全会和瞿秋白等人在纠正立三错误上的积极贡献，并给他们戴上了“调和路线”、“两面派”、“小团体”的大帽子，为后来

共产国际和王明等人否定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共产国际的10月来信，犹如在平静的水中投入一块巨石，在中国共产党内激起了轩然大波。1929年4月从莫斯科回国、长期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留俄学生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人，在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10月来信以前，便通过回国的其他留俄学生得知了这封信的内容。他们在中央对10月来信精神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把消息在下面广泛传播，在党内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王明，1925年在武汉入党，后被湘北党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王明读了不少马列主义著作，但他并不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指南，而是把马列主义的个别词句当作教条，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自以为是，夸夸其谈。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王明深得当时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欣赏和重用。1927年初，米夫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华工作，便把尚未毕业的王明带在身边充当翻译。后来，王明又随米夫回到苏联，被留在中山大学工作。不久，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他凭借自己的权力安排王明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的工作，担任重要译员，为王明捞取政治资本。从此以后，王明青云直上，成为中山大学支部局的负责人。王明在米夫的直接支持下，在中山大学大搞宗派活动。他们为打击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其他中国留学生，以所谓组织“反党”的“江浙同乡会”、“工人反对派”为名，对他们进行迫害，同时对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担任领导工作的瞿秋白等同志也加以种种攻击。

1929年4月，王明回到上海。他害怕国民党的白色恐怖

和艰苦的斗争环境。不愿到革命根据地去，也不愿进工厂深入群众，要求留在党的秘密机关工作。1930年1月，王明参加上海工联会的一次会议时被捕。他为了自己获救，竟不惜暴露党的秘密机关，向巡捕提供了党中央宣传部接头机关的地址，要组织上花钱保释其出狱。为此，王明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

王明自以为已掌握马列主义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是个空白，目空一切、颇有舍我其谁的架式。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发生后，在对革命形势和任务等问题的估计上，王明与李立三的观点本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依仗自己读了一些马列的书，便把“本本”摊开在桌子上，引经据典，咬文嚼字，与李立三展开了学院式的争论。李立三对王明等人结伙起哄、乱扣帽子的做法十分恼火，他在理论上辩不赢，就摆出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决定给王明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给博古等3人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六届三中全会时，王明等人对全会的报告表示同意。会后，中央决定派遣他们去苏区参加实际工作，他们也表示同意。但当他们得知共产国际10月来信的内容之后，便不肯前往苏区，在态度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开始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及全会后的党中央。

11月13日，王明和博古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声称“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路线，和国际路线不能并容，指责三中全会没有充分揭露“立三路线”的机会主义实质，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接着，王明又写了《两条路线》的意见书，抄成3份，在几十人中传阅，为其上台掌握中央领导权进行舆论准备工作。

这时，一些受到过李立三或三中全会批评过的地方党组

织成员也纷纷起来，认为党已经又一次面临“八七”紧急会议前夜的状况，要求中央改组。其中有些是好同志，如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他一直反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主张，受到了李立三的错误批判和处分。三中全会没有为他平反，反而又错误地指责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时，他的情绪十分激烈，也得到党内不少人对他的同情。此外，还有一些人长期以来对中央心存不满，如控制着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党团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人，这时也十分活跃，到处制造纠纷。

王明、罗章龙等人联名要求共产国际再一次召开像“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他们攻击的矛头越来越集中指向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特别是指向了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对中央的风潮。

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10月来信。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10月来信中的指示，承认三中全会采取了“调和态度”，同时也指出“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以此来回答反对三中全会的人们。

对于王明等人的小组织活动，中央也已有所察觉。在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等人对王明等人的小组织活动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改组中央领导的错误做法。

但是，此时的王明等人由于自以为有米夫的支持，有恃无恐，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更加猛烈地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指责它已经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要求由共产国际来组织临时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罗章龙、何孟雄等人，这时也要

求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来解决三中全会的所谓“调和路线”问题。

共产国际10月来信引起的风波，使中共中央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党内濒临分裂的危局。周恩来等人对此忧心重重，到处解释，夜以继日地向各方面做工作。但是风波仍然无法平息。

米夫导演的一幕

1930年12月中旬，正值中共党内风波四起，愈演愈烈的时候，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来到上海。他此行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直接插手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以保证王明等人上台。

米夫到达上海后，首先单独召见王明，听取汇报，面授机宜。王明同米夫商议后，心里有底，便左右开弓，在继续猛烈攻击中央的同时，对何孟雄、罗章龙等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王明看来，有米夫的直接支持，上台已成定局，不再需要何孟雄、罗章龙等人来共同反对三中全会，相反这些人已成为他上台的障碍，夺权的潜在对手。于是，他一反过去与何孟雄、罗章龙等人合作的态度，攻击他们是在假的反“立三路线”的旗帜下，企图以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来代替国际路线，以自己的右派小组织来占据党的领导机关，把“右派”的帽子狠狠地扣在何孟雄、罗章龙等人的头上。在米夫的授意下，王明等人改变了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要求召开四中全会，要把反对立三路线、反对三中全会后中